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演进脉络与发展创新^{*}

王 婷 苏兆霖

内容提要 在不断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充分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体系。本文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思想渊源和演进脉络，描述了这一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阶段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性与创新性，最后提出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思路 and 方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共同富裕理论体系

作者 王婷，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苏兆霖，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其他社会制度最根本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高目标。我国在不断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充分结合，阐述共同富裕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内涵和实现途径，不断进行共同富裕理论的中国化发展和创新；以

^{*} 本文系吉林大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项”项目“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路径研究”项目成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经过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充分发展，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紧密结合时代特征，既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共同富裕理论体系。本文将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文化渊源和理论根基，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演进脉络，进而尝试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在新发展阶段创新发展的方向与思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文化渊源与理论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文化渊源，既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同富裕的科学阐释，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求大同的基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文化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国理念中就出现了共同富裕的思想萌芽。在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理念，是共同富裕最早的思想渊源。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阐述了“大同”和“小康”的思想。在“大同”社会中，天下为公，全社会亲如一家，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摒弃私心，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鳏寡孤独均能得到良好的照顾，可谓对共同富裕社会的最初描绘。小康社会中，虽然存在私有制和利益的差别，但通过以礼治国能够实现社会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衍生出了“均贫富”思想，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管子提出“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等，都体现着对过大贫富差距的反对。^{①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根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

① 郭沂：《子曰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80页。

② （明）刘续：《管子补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36、462页。

国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刻地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让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美好生活的理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来自于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对未来社会的逻辑推演和科学构想，指出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和发展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① 未来社会的生产不再源于一部分人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而是以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为目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一再强调，未来社会中生产的发展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工业的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②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③

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所有人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未来社会的生产力将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④ 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物质财富快速地丰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有足够的物质条件，“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⑤ 共同富裕才能得以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能导致贫富的两极分化，而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和全面自由发展必须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才能实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除了自身劳动以外一无所有，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2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306页。

方式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并通过被剥削获得维持生存的必要消费资料，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变富有的只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无产阶级只能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根本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将转变为完全不同的情况，生产资料全部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所有社会成员都自觉参与劳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将带来所有社会成员富裕程度的共同提高。“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① 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共同富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表明了共同富裕将经过不同发展阶段，经历不同层次。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消费品将按照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进行分配，虽然劳动者的收入还会受限于个人天赋和劳动能力，但不会出现过大的贫富差距。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后，一切物质财富都极大丰富起来，按需分配成为可能，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得以实现，此时达成的将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探索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基础。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还不具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生产资料全部由社会共同占有、生产力水平极大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等条件，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充分结合，共同富裕思想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萌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创新发展以及新时代的系统完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体系，为中国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共同富裕思想萌芽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从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就带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怀，探索救民于水火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内核，探寻让贫苦的劳动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道路。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开始萌芽，主要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3页。

树立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想，思考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如何构建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在农村地区通过土地改革改善农民生活三个方面形成了共同富裕的思想火种，虽因复杂的战争局势和艰苦的生存条件无法采取系统的经济政策促进共同富裕，但对中国贫富状况的认识和在农村地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认识和追求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共同富裕理想的萌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穷苦的劳动人民身上。中国共产主义先驱将对底层民众的关怀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贯彻于领导革命的过程。他们省察旧中国的阶级剥削和社会压迫状况，向上表现为对腐朽统治阶级的控诉，向下则表现为对广大受苦民众的同情，尖锐地指出了无产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劳动者的收入不能维持“动物的生活”，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严重，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若不从速解决，社会不但不能进化，且将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①。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富裕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和革命的目标之一，描绘了革命胜利后的美好生活。他们认为未来社会“使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②；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③，农村将“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④。

（二）对实现共同富裕途径的最初探索

党的创始人对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进行了最初的理论探讨，提出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等。李大钊首先提出生产资料所有权要经历一个从私有到公有的过程，随后以集体的方式分配给劳动者个体进行使用，最终“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⑤ 蔡和森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底，就必不可免的要开始社会主义的转变”。^⑥ 陈独秀提出社会主义讲求公平

① 《李大钊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4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51页。

⑥ 《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95页。

地分配产品，但不是“均贫富”，其目的是克服剥削的产业和铲除剥削的阶级，以解放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人民，并非农业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不患寡而患不均”^①；他也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②。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共同富裕采取的政策措施

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以后，深刻意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紧迫性，在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等，“打土豪、分田地”都成为实现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毛泽东还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同时推行了减租减息、增加农贷等政策，有效地提高了农业产量。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立足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带领广大无产阶级摆脱阶级压迫，改善生活状况，为共同富裕采取了实质性措施。党对富贵豪强阶层进行打击和抑制，重点是缩小人民收入差距。这一做法使共产党受到了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拥戴，革命力量迅速壮大。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采取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土地政策和工商业政策，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贫苦农民获得了生产必需的土地。张闻天强调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他对小商品经济中存在的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小商品生产由于个体私有、进入门槛低，遵循“等价交换”规律，依照自愿进入与退出原则，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农民内部收入水平的分化，但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必恐慌；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开展合作化运动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把合作社同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根据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制定经济政策，使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服从于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③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共同富裕的初步探索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建立了新中国。如何使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0-480页。

②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③ 《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74-99页。

高追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借鉴苏联经验，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对什么是共同富裕以及中国怎样走向共同富裕进行了初步探索。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首次提出了“共同富裕”，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这一时期，我国共同富裕理论已经开始初步形成，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经历复杂、长期的过程，并在实践中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共同富裕起来。但这一时期对共同富裕的理解还存在一些误区，例如，对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缺乏清醒的认识，力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短时间内实现较低水平的“共同富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还没有清晰的概念；在分配过程中对按劳分配存在分歧，将公平视为平均，误将平均分配当作按劳分配，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导致生产陷入低效率循环，也没有真正找到在生产水平还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这些认识误区为我国在后来的共同富裕理论发展中厘清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现途径提供了教训。

（一）社会主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明确了社会主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是使中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唯一选择。1954 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合作所有制、个体劳动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但对富农经济和资本家经济采取限制、改造和逐步消灭的政策，并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① 这部《宪法》保障我国通过和平的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消除造成阶级剥削和无产阶级贫困的所有制根基，为我国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从农村发展来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消除两极分化，帮助全体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如果党不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农村必然发展起来，农村中的两极分化会加强起来”。^② 从全社会的视角来看，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经济发展将关心劳动者本身的全面发展以及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③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 年）》，2000 年 12 月 26 日，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26/content_4264.htm。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7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287 页。

^③ 王永锡、袁文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实质》，《经济研究》1962 年第 9 期。

（二）发展生产力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

在完成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党认识到发展生产力对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要想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就要将发展生产力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来抓。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指出，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就是要突出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①他还提出用生产力作为检验党和国家政策的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应当理解为一方面提高生产水平，一方面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③

（三）农村生产合作社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中央十分关注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共同富裕。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④同年10月，他再次强调，“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⑤

农村生产合作社在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农业的唯一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的工作中心”。^⑥农业合作化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全体农民的生活水平。^⑦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9页。

③ 王亚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总运动过程中究竟起什么作用》，《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7页。

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08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⑦ 赵履宽：《实现农业合作化和开放自由市场以后农产品采购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4期。

“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有力量保证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因而也能够更有效地与农村的资本主义活动和贫富分化的现象作斗争”。^① 农村生产合作社可以将零散的个人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形成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全体劳动群众共同参与劳动，防止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两极分化，消除农村的贫富差距。

（四）按劳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中是否应实行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否有利于共同富裕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立之后，按劳分配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不应坚持^②。按劳分配原则存在不平等因素，反映了在分配问题上仍存在人民内部的矛盾^③，劳动报酬的差距即使使用税收工具进行限制，也无法消除^④。从革命发展论和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指出不应当仅满足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应妥善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⑤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我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尚不能实行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是适合于生产力水平的分配方式^⑥。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作为不劳而获的剥削制度的对立面出现的，实行按劳分配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才能在劳动者之间实现平等^⑦，同时能从物质利益上奖励先进、督促落后，从而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⑧。按劳分配原则可作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方式。^⑨ 显然，这一时期我国对按劳分配是否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还未达成一致的认识。

“文革”结束后，我国围绕按劳分配问题组织了四次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内容主要涉及按劳分配是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是否会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按劳分配中是否应当有物质利益刺激、按劳分配应如何贯彻等问题。虽然在讨论过程中，仍有学者认为按劳分配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会导致个人财富差距等，但大部分学者对我国在生产力水平较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性有了清晰的认识。他们指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65页。
② 李石泉：《按劳分配原则具有资产阶级法权性质——与刘庆堂、张玉璞同志商榷》，《江汉学报》1963年第9期。
③ 姜铎：《必须全面地看待按劳分配原则》，《学术月刊》1959年第6期。
④ 汤国钧：《我国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经济研究》1958年第7期。
⑤ 狄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决定和价值量计算等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63年第5期。
⑥ 刘敏：《“按劳分配”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理论战线》1958年第9期。
⑦ 黄逸峰：《试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与按劳分配问题》，《财经研究》1958年第9期。
⑧ 蒋学模：《商品问题上的争论不仅是概念之争》，《学术月刊》1959年第4期。
⑨ 骆耕漠：《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它的“消亡”过程——关于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研究》，《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

出，按劳分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其平等权利体现了等价交换的原则^①，符合社会主义阶段的客观经济规律^②；按劳分配引起的差别不是阶级差别，在公有制基础上，按劳分配引起生活富裕程度的差别不会导致两极分化^③，在按劳分配过程中可以处理好收入不平等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④。讨论结束后，我国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不会产生阶级分化等问题有了准确的把握，按劳分配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得到了积极贯彻。

（五）实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经历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地进行调查和研究，寻找适当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⑤。他还告诫广大干部群众，“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⑥。实现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这当中甚至还可能不可避免地发生倒退^⑦。这一时期，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多长的时间能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虽然还没有很清晰的认识，但已经意识到我国经济底子薄、人口基数大、科技水平低，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对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对实际的经济状况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马克

① 卫兴华：《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一些商榷意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2期。

② 张朝尊、项启源、黄振奇：《关于按劳分配规律的几个问题》，《经济科学》1979年第1期。

③ 吴宣恭、谢佑权：《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中国经济问题》1977年第4期。

④ 胡培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写在社会主义旗帜上的分配原则》，《中国经济问题》1977年第4期。

⑤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⑦ 关梦觉：《毛泽东主席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的贡献》，《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1期。

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达到新境界。“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明确了共同富裕理论创新的历史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为我国探索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新的制度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实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将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的本质高度来认识，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切改革都是为了更好实现这一目标；二是确立了“先富—后富—共富”的发展思路，为我国在生产水平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道路；三是创造性地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保障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并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四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推进共同富裕的思想引领；五是辩证理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明确了共同富裕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科学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 这一概括既强调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将实现的结果，偏离了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无法得到体现；又说明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关系中剥削和两极分化的消除，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共同富裕是最高的追求，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探究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有学者从社会主义本质角度解读共同富裕，为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开阔的研究思路，明确指出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容易滑入教条主义的错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最终是否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把共同富裕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准，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原则。^② 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必然要服从于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满足全体劳动者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追求共同富裕。^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不再局限于经典理论的解说，开启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背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下，探索中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3 页。

② 包心鉴：《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山东社会科学》1992 年第 4 期。

③ 顾学荣：《试析社会主义的本质》，《教学与研究》1993 年第 2 期。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的本质表明，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发展生产力在我国一切任务中的中心地位，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②在发展生产力的途径上，邓小平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指出只有依靠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共同富裕才能尽早实现。在经济体制上，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落后，要实现快速的发展和赶超，就要使用能够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方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③

学界围绕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研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是阻碍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解放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必须持续深化地进行改革，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归宿点。^⑤有学者提出应更加注重效率，确保社会生产力的高速进步；生产力进步会造成“时差性”的贫富差距，但也会减少绝对贫困的比例。^⑥对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的探讨，引发了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初步思考，使人们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低水平的平均，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速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邓小平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上提出了“先富—后富—共富”的设想，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尽快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行路径。他指出了我国过去搞平均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4页。

④ 熊映梧：《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纲领》，《学术交流》1992年第3期。

⑤ 卫兴华：《改革20年来经济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回顾与评析》，《经济评论》1999年第1期。

⑥ 张琦：《关于贫困问题的几点认识》，《农村经济》1988年第9期。

的弊端，“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①他创造性地提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水平下，只能通过先富带后富的途径来尽快实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②他认为，我国在经济政策上允许一部分地区、企业和个人，通过辛勤劳动先获得多一些的收入，生活率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作用，带动左邻右舍和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人向先富起来的群体学习，就能够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体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③

同时他也一再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是为了要实现共同富裕。关于先富裕起来的地区与后发展的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他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是要使广大沿海地带和两亿多群众先富裕起来，从而更好地带动内陆地区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要更多地帮助内陆地区发展，这也是大局，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都要服从这两个大局。两极分化是共同富裕的对立面，邓小平突出强调社会主义制度要避免两极分化的产生，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不是放纵两极分化的产生，“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④邓小平提出，对于人民群众之间出现的贫富差距要予以重视，必须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要对富裕起来的人有一些限制，比如征收所得税，富裕起来的人也应当自愿回馈社会。“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⑤。当 20 世纪末我国即将步入小康社会的时候，还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一问题。

“先富—后富—共富”的思路在学界引发广泛反响。学者们普遍认同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认为先富政策是共富的战略选择。^⑥学者们提出在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也要着重关注贫富分化问题，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两极分化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客观存在两极分化的生成机制。^⑦共富实现过程中也可能出现良性两极分化，重要的是对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5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66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52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10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64 页。

⑥ 程树礼、李由：《关于共同富裕的思考》，《教学与研究》1992 年第 5 期。

⑦ 金喜在、齐晓安：《关于共同富裕》，《高校理论战线》1995 年第 5 期。

贫困家庭继续做好扶贫、社保等救助工作。^①在推进“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中，不能片面强调生产力标准，忽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造成贫富分化的结果，偏离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②

（四）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带领十几亿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选择，“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③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候就能够更好地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④“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⑤虽然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可以存在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但邓小平一再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⑥在分配关系上主张用物质利益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注重按劳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真正的按劳分配不是“吃大锅饭”的平均分配，而要体现劳动贡献，“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⑦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中始终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确保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和按要素分配的存在不会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学界深入研究了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对

① 胡培兆：《共同富裕与良性两极分化》，《理论前沿》2003年第22期。

② 于金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兼与汪海波、何伟与胡钧等三位教授商榷》，《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1期。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7、20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

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基本途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体系)”。^①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是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只有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条件，将社会生产力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后，才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条件。^②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发挥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实现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以及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促进共同富裕。^③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引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④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⑤

(五) “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对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启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推进共同富裕的奋斗历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的首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丰富了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是推进共同富裕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创新，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追求共同富裕的思想引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对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对新世纪如何解决贫困问题筑牢共同富裕的雄厚基础作出的回答；“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表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将人民群众文化层面的更高需求纳入共同富裕的基本内容；“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接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表现出共同富裕思想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表明了我国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的决心。^⑥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表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共同富裕

① 郭翔宇：《市场经济、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学术交流》1999 年第 3 期。
② 卫兴华：《关于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③ 张宇：《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④ 蒋学模：《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商业经济与管理》1993 年第 5 期。
⑤ 裴小革：《共同富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红旗文稿》2011 年第 20 期。
⑥ 张学森：《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意义》，《社会主义研究》2006 年第 3 期。

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① 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施的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有利于统筹全社会的物质文化资源，^② 保障改革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推进。

（六）共同富裕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共同富裕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我国对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是随着分配格局的变化逐渐完善的。20世纪90年代，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着普遍的平均主义现象，在创造条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领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强调打破平均主义，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③。对于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收入差距，我国强调“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④，反对平均主义的同时防止两极分化，努力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到21世纪之初，改革分配制度、让全体社会成员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成为这一时期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针对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十七大报告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提出“提低、扩中、调高”的分配制度调整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提出了“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伴随着分配制度的改革，我国学界进行了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大讨论。一些学者认为提高效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强调破除平均主义的必要性，认为分配制度改革

①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② 陈映：《共同富裕的区域经济学解析》，《经济体制改革》2009年第3期。

③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34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应突出效率原则^①，推动各种生产要素进一步向效率倾斜，充分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②，唯此才能快速地提高我国的生产力。也有学者指出，不能一味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随着经济总量发展、经济效率问题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社会公平会逐步上升为突出的问题，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③。不能把提高效率作为牺牲公平的借口，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不全是提高效率的结果，对效率的追求也无法脱离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离开分配的公平合理，效率也得不到保障^④。发展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指标数字的增长，还包括人民需求得到实质性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以及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因此，效率只有在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坚持社会代际公平的原则时，才有实际意义。^⑤事实上，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发展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实现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的制度基础，能够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保障分配公平。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是手段，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全面发展才是目的。公平的竞争秩序、平等的社会权利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行，有利于发挥制度的激励和调节作用，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生产力发展。^⑥

（七）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克服市场缺陷、保障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⑦在此基础上，学界围绕如何更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广泛研究，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调节社会公平程度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提出了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社保公平程度等的路径。发展社会保障应处理好社会保障中存在的不同

① 董正平：《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

② 李成勋：《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中的一个新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代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③ 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

④ 程恩富：《公平、效率与经济人分析——与张五常先生商榷之二》，《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

⑤ 何干强：《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效率与公平》，《人民日报》2007年3月23日。

⑥ 张宇：《关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思考》，《光明日报》2006年4月4日。

⑦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公平问题，推动社保改革和整个国家的改革同步；辩证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使社会保障制度贴合公平原则，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和共同富裕新形势的需要。^① 注重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形成城乡一致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基础。^②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体系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和各类矛盾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明确了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引领，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等，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共同富裕发展道路上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精准扶贫和对口帮扶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③ 2013年11月，他在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此后，我国将“精准扶贫”作为了新时代消除绝对贫困的指导思想和关键举措。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了“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明确了精准扶贫的基本思路。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大举措。^④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巩固和深化，两者紧密联系。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后，习近平进一步提出巩固脱贫成果，统筹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

^① 梅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李占才：《学习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若干思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础工程》，《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③ 习近平：《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 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2015年11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8/c_1117292150.htm。

^④ 颜珂、侯琳良：《东西部扶贫协作气象新》，《人民日报》2020年7月19日。

效衔接。从产业入手，做好发展衔接；从机制入手，做好政策衔接，从治理入手，做好服务衔接，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新时代新农村成为共同富裕重要的实践成果。

精准扶贫把贫困问题、民生问题和共同富裕联系起来，是新时代实现全面小康的理论进路。^① 共同富裕是精准扶贫思想形成并深化的理论基础，新时代背景下，精准扶贫政策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治理手段，将贯彻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富裕的评价基准，有利于构建共建共治的扶贫机制，提高共同富裕建设水平。^② 精准扶贫思想注重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统筹东西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推动我国共同富裕从追求数量的增多转变为质量的提升。^③ 前贫困地区正处于由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的过渡阶段，一方面需要完善政策机制，持续提高群众收入，巩固精准扶贫的成果；另一方面需要调整工作重心，从个体精准扶贫向乡村精准振兴转变，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④ “塘约道路”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构建发展利益共享机制和充分利用政府及跨区域外部资源等方法的有效性，为我国广大西部地区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启示。^⑤

（二）新发展理念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思想引领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集中表达了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的发展动力、方式、路径、目的。其中，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发展成果应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解决好共同富裕问题。共享发展理念包含四个维度，即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⑥ 这四个维度全面回答了共享发展的参与群体、共享的内容、共享的途径和实现过程。共享发展的内涵与共同富裕是高度契合的，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确保了共同富裕是通过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实现的生活水平的普遍、

① 李先伦、李建民、房晓军：《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战略创新》，《现代经济探讨》2017年第3期。

② 于海利：《新时代背景下的精准扶贫：新要求、新困境、新方略》，《社会政策研究》2018年第2期。

③ 胡炳琰：《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综述》，《改革与开放》2017年第24期。

④ 周文：《贫困地区从扶贫开发到乡村振兴——进程、难点与路径》，《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20年第2期。

⑤ 韩文龙、刘明辉：《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践创新——以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为例》，《中国西部》2019年第2期。

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15年10月29日，http://china.cnr.cn/gdgg/20151029/t20151029_520328336.shtml。

不断提高，是包含物质充裕、精神富足、生态环境优美、社会保障完善等的全面共同富裕，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逐步提升层次的渐进式共同富裕。

新发展理念秉承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把发展的目标锚定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与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具有内在一致性^①，既涵盖了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彰显了对效率问题的新思考和新解答，又体现了分配公平的评价准则^②。新发展理念的提法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强化了发展的起点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定位，以及发展的目标是全体人民对生活作出满意的评价。^③ 牢牢把握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是追求共同富裕奋斗征程上的根本原则。

（三）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全新概括为理解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新框架和新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共同富裕的内涵是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也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对社会矛盾变化的准确把握有助于理解共同富裕内涵的纵深发展和维度变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标志着人民需求层次的拓展和提升、经济发展表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同样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和文化需要，还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富足的物质财富、更充实的文化产品、更优美的生活环境、更和谐的社会氛围，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当前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需要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平衡区域、城乡发展，加快完善“先富”带动“后富”的有效机制。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视阈下认识共同富裕，可以发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加要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改变过去主要侧重物质财富的评价方法，注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就是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

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启发学界从共同富裕的目标审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① 夏锦文：《牢牢把握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红旗文稿》2017年第17期。

② 方凤玲、白暴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探索（上）》，《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

③ 洪银兴：《以新发展理念全面开启现代化新征程》，《人民论坛》2020年第31期。

与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①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普遍性与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既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出现的新挑战，也潜藏着用新的思考方式、新的机制选择、新的实现路径追求共富理想的珍贵机遇。^②

（四）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机统一是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要提高发展协调性、平衡性、包容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等。^③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以投资驱动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协调的整体格局，是我国当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同时，能否有效推动共同富裕也是评价经济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最高标准，因为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根本体现，这些都表明高质量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实现共同富裕。可以说，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共同富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道路与目标的有机统一。

完善分配制度是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既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产生了制约影响；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让劳动要素与其他要素共享分配成果。^④ 对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二者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性和发展协同性，但整体共享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应当成为今后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于共同富

① 卫兴华：《应准确解读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② 刘儒、贺升杰：《诠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三个维度——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0期。

③ 习近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人民日报》2021年8月17日。

④ 任保平、王思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共享发展的理论创新及其实现路径》，《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1期。

裕的发力方向。^① 在新发展格局中提高共同富裕程度需要在分配环节加快解决居民收入分配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②

（五）人民群众的劳动和创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力量，我国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劳动和创新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曾多次强调，人世间一切幸福都要靠辛勤劳动创造，每个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都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靠所有人的共同劳动和相互帮助，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③ 将提升人民自我发展的能力作为共同富裕的推进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结合起来，是我国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的制胜法宝，同样也有利于最广泛地调动 14 亿多中国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共同富裕起来。

（六）设计阶段性目标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对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不同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它有助于更好地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确主要矛盾，有的放矢地制定发展政策。同样地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可以使不同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目标更为明确。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设计了阶段性目标，体现出对实现共同富裕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 2050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明确了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基本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十四五时期”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出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体现了循序渐进推进共同富裕的原则，表明了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充分认识经济社会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挑战。针对短期、中期、长期提出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也有利于将共同富裕具体化，避免将共同富裕作为遥远的终极目标而导致在经济发展中忽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认为出现贫富差距是发展必然经历的过程，当生产发展到极高水平时才能解决。设定明晰的时间表，也表明了党中央

① 史琳琰、胡怀国：《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研究》，《经济与管理》2021 年第 5 期。

②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2 期。

③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2021 年 8 月 17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8/17/content_5631780.htm。

推进共同富裕的坚定决心。

（七）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探索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有效方法

“先试点、再推广”是更好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方法。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延续了改革过程中“先试点、再推广”的思路，在浙江设立了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①，并进一步提出了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美丽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建设目标和路径，为更好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和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提供了基本框架。选择浙江省作为先行示范区，是基于其经济发展相对领先，能够调度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致力于共同富裕建设，能够避免较大的试错成本和政策反复的影响，为全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从国际视角来看，浙江省是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将助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优势，成为为全球发展与富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窗口。^②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时代新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讲话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③ 将共同富裕作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期的重要发展课题，正是印证了邓小平曾经提出的，在实现小康社会以后，就要突出地解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继承性最好的体现，也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是系统的体系，是遵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2021 年 6 月 10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06/10/content_5616833.htm。

^② 何立峰：《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为全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宏观经济管理》2021 年第 7 期。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指导中国不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科学理论。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其内涵应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始终如一的目标；第二，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第三，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和谐的有机统一，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第四，共同富裕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我国在不同阶段追求共同富裕的侧重点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变化，共同富裕的具体评价指标也会相应变化；第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调节作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第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原动力，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和创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力量，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为了更好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基于此，共同富裕在我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 万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全新历史起点，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中创新发展共同富裕理论掀开了新的篇章。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应更好总结共同富裕新的时代内涵，探索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应对以下时代课题予以解答。

第一，阐述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首先应当明确我国当前要实现的是怎样的共同富裕。显然，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与经典理论中所描述的共产主义在实现了按需分配时的共同富裕有所区别，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也绝不是福利国家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加高税收高福利。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提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①如何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共同富裕具体的时代内涵，如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应提升到什么水平，收入差距的合理区间是什么，社会保障将达到什么高度，精神生活的富裕指哪些方面等，都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问题。

^① 《人民网评：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021 年 8 月 19 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1/0819/c223228-32200352.html>。

第二，构建科学系统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恰当合理的阶段性目标。共同富裕是一个经济社会整体协调的发展阶段，既包含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再生产环节的良性循环，也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提高、城乡发展平衡、区域发展协调、社会保障体系更健全、公共服务更均等、生态环境更优美、民主政治更完善、人民群众幸福感更高、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得到更好满足等。在以往对共同富裕的评价中，较为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容易造成将共同富裕缩小为生产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关系问题，导致无法有效地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因此，构建一个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共同富裕发展阶段性目标，设计“十四五”时期、2035年、2050年将要达到的具体发展目标，循序渐进地推进共同富裕，对于政策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从整体上系统把握共同富裕政策的整体协调性。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多方面矛盾，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界的作用，协同各个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这些政策不应互相掣肘，整体上需协调统一，既能有效推进共同富裕，又满足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要求。因此，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矛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上，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环节。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为研究共同富裕政策效果提供了试验田，应充分发挥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先导作用，能够为全国推广系统高效的共同富裕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共同富裕是全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思想，在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在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的同时也展现出严密的继承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不断创新的伟大成果。其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时代化的阐释，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体系。不同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思想符合各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选择均基于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目标，是马克思主义阶段性研究方法的具体体现。同时，其继承性表现为：后一个发展阶段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是在前一发展阶段的理论发展基础上的创新；后一发展阶段探索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

的起点，正是前一发展阶段追求共同富裕所取得的成果；不同发展阶段设定的共同富裕目标引领我国一步一步向共同富裕前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时代化的理论创新的系列成果，是一个在不断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理论体系，其发展历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相连。这一理论体系已经指导我国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也必将引领全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Wang Ting Su Zhaolin

Abstract: In the progress of pursu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integrated Marxism theory with the practice of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ed the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has explored the ideology origins and evolution progress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scribed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in every developmental stage of China and the New Era, analyzed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proposed th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in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age.

Key words: Marxist theory; socialism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Authors: Wang Ting, researcher of China Center for Public Sector Economy Research,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Su Zhaolin, under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